

树立中国榜样 再添国家荣耀

□新华社记者 王恒志

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4日下午正式成立，431名运动员将参加30个大项225个小项的角逐，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依旧严峻的当下，中国代表团无论是参赛规模还是参赛小项，都创境外参赛之最。期待中国健儿在东京力争佳绩、超越自我的同时，全面展现体育精神和新一代中国青年形象，为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树立中国榜样，为祖国再添荣耀。

使命在肩，奋斗有我。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东京奥运会推迟一年举行。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大量比赛被迫推

迟或取消，很多项目的海外训练备战计划受到严重影响，但中国体育健儿克服重重困难，境外参赛规模和参赛小项均创新高。在参赛运动员中，既有初出茅庐的小将，也有三届、四届奥运元老，更有不少复出的“妈妈选手”，奥运会尚未开幕，中国军团已经打响了“头炮”。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将东京奥运会的举办比作“黑暗隧道尽头的一束光”。在东京，中国体育健儿不仅要争金夺银，更要在全人类共同的病毒威胁面前，展现中国体育一以贯之的团结协作、顽强拼搏、艰苦奋斗、永不言败的精神，让中国体育人和中国体育

在东京闪耀夺目的光芒。2022年我们又将迎来北京冬奥会，人类将再一次在奥运旗帜下展现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必胜信念。从这个角度看，即将出征东京的中国代表团也是北京冬奥宣传队，肩负着让中国体育这束光持续闪耀的责任。

使命在肩，强国有我。在本届代表团中，有近七成的运动员是首次参加奥运会，平均年龄只有25.4岁。五年前的里约奥运会，中国健儿向世界展现了中国青年的崭新形象，也在国内大量“圈粉”。傅园慧的“洪荒之力”、宫金杰和钟天使的京剧脸谱头盔、秦凯颁奖现场向何姿求婚的动人场景……都

在成绩A面之外，传递出自信、独立、乐观、温情的人生B面。

本届奥运会将在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下举行，在全人类共同的困难面前，我们尤其需要中国运动员用丰富的情感表达向世界展现强大的人格魅力，推动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理解。期待本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在多出好成绩的同时，能再出几个“爆点”、成就几个“网红”、树立几个“偶像”，让体育的力量感动人心，用体育的温情抚慰人心。

还有9天，东京奥运会就将开幕，中国体育健儿，加油！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盲文图书应该摆放在哪儿

■余宗明

据《半月谈》报道，早在2017年年底，我国省地县三级公共图书馆就设立了盲文及盲文有声读物阅览室959个。但有些地方图书馆的视障阅览服务区功能齐全却闲置，馆藏千余册盲文书几乎无人借阅，有的辅助阅读设备还没用过就淘汰了。与之相对的是，盲校所用的教辅资料十分紧俏，特教师生长期面临“等盲文教材来、缺盲文习题练”的困境。

为视障者打开知识天窗，是关爱残疾人群的必要之举，也是公共文化服务普惠的题中应有之义。就现实情况看，针对视障群体的知识扫盲仍存在“欠账”，阅读普及仍需要加强。正因如此，“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满足残疾人基本文化需求”早就被提上了政策日程。而各地在公共图书馆设置盲文阅览室，就是落实性动作。这原本是惠民善举，体现了对弱者的关怀，保障视障人员的阅读权，也需要类似的公共服务延伸拓展。

但建是为了用，不用就是资源浪费。当下，一些地方盲文阅览室遇冷、馆藏盲文书借阅率几乎为零的尴尬局面，就给许多公共图书馆和相关管理方提了个醒：兴建盲人图书馆或在图书馆设置盲文阅览室，不应是为了标准建设，而应是为了受众。这些图书馆不能只盲目购入盲文书，却不注重跟视障者阅读需求衔接。盲意味着接受信息的视觉通道受阻，随之而来的往往是社交隔绝。考虑到这一点，图书馆方面要主动跟视障群体接触，不能让自己陷入另一种“盲”——只看到那些指标，看不到视障者需求。

不去盲文阅览室、不借盲文书，不等于许多视障者没有阅读需求，他们的需求只是被较高的获取门槛挡住了而已。现实中，有些视障者都不知道哪里有盲人图书馆或盲文阅览室，即便知道了，去图书馆需要下楼、上街、

乘车、入馆，馆内盲文阅览室开放时间、图书检索、借还规则等也并不“友好”。主客观条件制约之下，那些盲文阅览室已不是视障群体阅读的刚需场所。

相比之下，视障群体的高频阅读需求场景，往往集中在家里、盲校、盲人按摩店或“500米生活圈”等熟悉区域内。但盲文书却很难进入这些地方，这造成供需在物理距离上的结构性不对称。从报道中可知，有些盲校所用的盲文书籍尤其是教辅资料十分紧俏、很难获取。一边是图书馆的盲文书“积灰”，一边是盲校书籍奇缺，这显然需要盲文书籍资源的合理调配。鉴于此，各地相关部门不妨开展精准调研，让服务与需求对接上，让很多盲文书该下沉下沉，切实降低视障群体获取盲文书的难度，提升“适盲服务”精准度。

如今，已有部分图书馆尝试让盲文书“流动”至盲人按摩店、特殊教育学校图书室，还有图书馆开展了“盲文读物寄/送到家”服务。比起坐等视障者上门，让盲文书处在最合适的地方，显然是更可取的思路——满足视障群体求知诉求，让他们阅读方便起来，与其靠人的走动，不如靠书的流动。视障者的方便，比图书馆管理者的方便更重要。

除了纸质书外，满足视障群体阅读需求，还可以更多地将解题思路瞄准电子化有声书籍和音频内容。无论是AIoT（人工智能+物联网）催生的AI虚拟助理、人工智能音箱，还是指尖阅读器类的智能手环，都可以为视障人群所用。有条件的地方基层单位可以将此类工具与内容的供给作为文化惠民的一部分。

回到盲人图书馆，盲文阅览室闲置问题上，这些针对视障者的阅读场所，不能为设而设，也不能只顾着购入盲文书，而应秉持“视障者需求导向”，让“无障碍阅读”轻易可及，让视障群体在“想读就读”中产生更多获得感。

（据《光明日报》）

画中有话

近视低龄化

近视低龄化问题
仍然突出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再那吾东·玉山7月13日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0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2.7%。通过多部门合力推进，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新华社发
徐骏作

2020年
我国儿童青少年
总体近视率
为52.7%



应注重让校外补课班涵养“教育良心”



■吴继峰

对于是否有必要参加各类校外培训，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觉得应该让孩子完全“释放天性”，还他们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也有人觉得，社会正在悄悄惩罚那些“偷懒”的孩子，决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很显然，站在任何一个极端考虑问题，都是不可取的。曾经“快乐教育”的“鸡汤文”盛行，受这些暗示和影响，不少家长赞成让孩子自由发展、自由选择，放纵孩子自由生长，孩子不爱学习也不去干预，任凭孩子随着自己的喜好学习。但是学习是真正快乐的事情吗？“头悬梁、锥刺股”“板凳要坐十年冷”“梅花香自苦寒来”等等这些典故、名言都告诉我们，学习本来就是一件苦差事。你只要释放其天性，很多孩子便会选则贪玩。那些所谓能让孩子“在玩中学习，在玩中提升”的理念，一时讨巧尚有可能，

长此以往一定会让孩子在“释放天性”的同时一步步沦为“差生”。

有些孩子接受知识相对慢一些，或者在某个阶段由于某些特殊原因有些章节没有学得太好，怎么办？那就补课呗！于是，奥数、英语、作文等等，你报我也报，几乎办成了“校外之校”。学费动辄几千上万，接接送送劳神费力，真正了解一下，是没有哪个家长心甘情愿把孩子送到补课班的，但是没有办法。“您来，我们培养您的孩子；您不来，我们培养您孩子的竞争对手！”受这种焦虑情绪的裹挟，家长想不盲从是很难的。

所谓的“差生”到底需不需要适当补课呢？当然是需要的。但是，笔者以为，这样的补课活动最好不要推向社会、交给市场。阶层的固化起点就是教育的不公平，而让市场配置基础教育资源，有钱就能“开小灶”，有钱就能接受“一对一”的辅导，就一定会打破基础教育的普惠性和公平性。

教育事业尤其是基础教育事业是个良心活。当前，我市正在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专项治理。那些从事应试、超标、超前培训及与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毫无疑问应该明令禁止。但同时，我们也应该通过思想教育和政策引导，让这些培训机构多一些“教育良心”，少一些“向钱看”的趋利性，让教育回归传道授业的初心。②5